

March 2015

Representation, Working and Imagination of Power: A Study on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other "Against-Current Novels"

Qinghua C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ao, Qinghua. 2015. "Representation, Working and Imagination of Power: A Study on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other "Against-Current Novel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2): pp.120-12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2/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权力的表达、运作与想象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它“逆流小说”

曹清华

摘 要: 王蒙著《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他“逆流小说”一个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忽视的方面,在于对权力以及权力的表达与运作方式的质疑、解剖和挑战,与小说作为表达的一种,其本身所展现的表达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小说一面质疑现实权力的表达与运作方式,一面又贯穿着对于权力的“想象”,担负起与实践中的“权力网络”相类似的征询功能。与此同时,小说一面被权力者纳入权力清洗系统当中,一面又为权力组织所不容,成为权力再清洗的对象。

关键词: 王蒙; 权力; 表达; 想象;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作者简介: 曹清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电子邮箱: qinghuacao@hotmail.com

Title: Representation, Working and Imagination of Power: A Study on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other “Against-Current Novels”

Abstract: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Wang Meng's novel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other so-called “Against-Current (*Niliu*) Novels” is the questioning, exposing and challenging of the way power is represented and worked and the way power is related to its representation and working in these novels, but this has been overlooked for quite a long time in the research scholarship.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novels call into interpell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and working of power in reality while the imagination of power permeated in these novels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interpellation similar to the in-practice power interplay. What is more, the powerful institution put the novels into the purging system of power while the novels are not accommodated by the power system and become the target of re-purging.

Keywords: power; representation; imagination; Wang Meng;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Author: Cao Qinghua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qinghuacao@hotmail.com

王蒙著《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下称《组织部》)发表于1956年9月的《人民文学》。围绕这篇论文的评论与研究从小说甫发表一直延续至今。最近仍旧有不少研究者以这篇小说为专门的范例,来揭示和分析文学史问题。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的《“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一文搜集了半个世纪以来“能够显示‘当代文学问题’”的“批评、解读材料”,致力于探讨这篇小说所涉及的“当代文学问题”(282-94)。然而这篇小说对极左时代的权力以及权力的表达与运作方式的

质疑、解剖和挑战,与小说作为表达的一种,其本身所展现的表达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联,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一研究角度,对于揭示与概括同一时期受到批判的其它作品的历史位置和当下价值,亦提供了新的视野。

一、组织部/年轻人

为什么是组织部?^①组织部便是权力的组织部门,负责权力的征询、分配与维护。正如小说的

开头,“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向初来乍到的“小学教师”林震所介绍的:

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管什么家呢?发展党和巩固党,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的,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样作好了,党组织就是坚强的,活泼的,有战斗力的,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完成和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王蒙 30)

“权力”在刘世吾的表达/编码系统中,已经被一个人格化的“党”所替代。谢泳曾以“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来对应“组织部”与“青年”这一组意象,是很有启发意义的(32)。他所说的“党文化”,事实上,便是一种特别形式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的表达与运作方式。其行使“能指”功能的关键词“党”,连接着一个高于具体个人的、抽象、崇高而有着集体意味和历史承担的人格化形象。

刘世吾围绕这一关键词的语言表达,在林震眼中只是些“深奥”的“概念”,无法“全部把握住”。而在实质上,这一整套概念的具体所指是“组织部”作为一个“管家”,在权力的分配、维护、清洗方面的职责。林震的直接上司韩常新用来“教训”下级的语言——“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党不管党”——同样关乎权力的运作,为林震所“弄不明白”。而刘与韩“纯熟”地驾驭这些概念,“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的能力让林震十分钦佩。

尤其令林震困惑的是“权力”的实际运作。在19人的组织部中,15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党的工作。“到区委会的第四天”,林震就去了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发展党员”,事实上便是实践“权力”的征召与询唤功能,为权力组织征询认同与服从者。林震第一次进工厂,无法完成“组织”交给的这项任务,而韩常新为他提供了完成这项工作的样本,亦即“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

[……]本季度(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月)麻袋厂支部基本上贯彻了积极慎重发展新党员的方针,在建党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通过的党员朱××与范××受到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鼓舞,增强了主人翁的观念,在第一季度繁重的生产任务中各超额百分之七,百分之四。广大积极分子,围绕在支部周围,受到了朱××与范××模范事例的教育,并为争取入党的决心所推动,发挥了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良好地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任务[……](王蒙 33)②

对于这样一个“简况”,林震接连发出疑问——“这是根据什么写的?”“他们在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建党工作么?”而韩常新笑他不懂“行”。小说中这个打引号的“行”字,便是权力组织实施“征询”功能之“行”——权力要在征询者与被征询者之间建立的不是严谨的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而是指向权力关联的象征关系,这种象征关系通过不间断的复述来巩固与维护。当林震质问“这些数字和事例”是否可以用来“写第一季度的捕鼠总结”时,韩常新则说“那可以灵活掌握[……]”(王蒙 33-34)。在事实上,权力组织承担着维护权力象征关系的职责,其方法便是“灵活”的复制。

同样,令林震目瞪口呆的是“厂长”王清泉的“情况”,以及“组织部”对王清泉的“情况”的了解及处理意见。王清泉既是“厂长”,属于权力者;又是权力的驯服者,是嵌入整个权力网络中的一环。③王清泉行使权力的方式是“开会”——“每月在工会大会、党支部大会、团总支大会上讲话,批评工人群众竞赛没搞好,对质量不关心,有经济主义思想……”/“今天中午十二点十分,你通知党、团、工会和行政各科室的负责人到厂长室开会”(王蒙 32)。④在权力组织者眼中,作为权力网络中的一环,王清泉的“官僚主义”本身便是服从与维护这一权力网络的产物。权力组织的最重要的功能,并非判断是非(好坏),而是维护这一既定的权力网络的稳固与延续。⑤因此,王清泉“不是组织处理问题而是经常教育问题”。刘世吾所谓的“解决这个问题时机尚未成熟”,指的便是王的“情况”,尚未构成对权力网络的实质性危害。

相反,组织部却要求林震、魏鹤鸣“尊重领导,加强团结”,并批评他们召集座谈会“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究其实质,便是告诫这些尚未被权力组织驯服的局外人,必须认可、服从并置身于权力“组织”及其“纪律”的运作当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震是一位“年轻人”,是《皇帝的新装》里面的那个孩子。就表达系统而言,“林震所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课堂五环节’、‘直观教具’”(王蒙 30)。在社会实践的一面,林震念念不忘的是远离权力网络的学校——“他仿佛看见了系蝴蝶结的李琳琳,爱画水彩画的刘小毛和常常把铅笔头含在嘴里的孟飞[……]他所熟悉的孩子的世界已经离他而去了,现在是到了一个有些陌生的环境里来了”(王蒙 36)。对于这个“权力与权力组织”的环境,林震是局外人与陌生者。权力组织部门有关“权力”的语言表达与实际运作,让林震感到震惊。

二、从组织部到编辑部

不仅仅是组织部。同样甫发表便引起广泛关注的“逆流小说”^⑥——《本报内部消息》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省报的“编辑部”里。事实上,与大多数的“逆流小说”均出现了与“组织部”或者“组织”相关的情节相类似,这一类小说亦基本上拥有“编辑部”或者与“编辑部”相关的情节。^⑦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编辑部?

应该说李希凡的分析是确切的:

故事情节虽然是发生在一个报纸的编辑部里,而情节的基础却伸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党的宣传教育武器——报纸,这是社会生活最敏锐的感官,它每天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反映生活中新发生的事件和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因此,以“报纸”为背景,就不能不涉及到我们广阔的社会生活。实际上刘宾雁所以选择这个背景,也正是为了便于使用所谓“干预生活”的武器,来歪曲和诽谤我们的党和整个社会生活。(“论”5-6)

“组织部”是“权力”的组织部门,其有关权力

的表达与实践,与权力者发生直接的关联。而编辑部是“党的宣传教育武器”,其职责在于向广大社会讲述权力与传递权力,通过相对易于接近的语言/图像符号在广大社会“编辑”与复述权力网络(宣传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它有着权力的神经末梢的功能,触角延伸并寄居于社会机体的最边缘的表皮之下。

“编辑部”的功能,首先是各种会议、讲话、指示、决定、报告等权力运作方式的延伸——“从省委会议上得到的启示,常常使总编辑发现必须组织一版文章集中谈一个问题——比如说准备种籽或是积肥。于是,十一点以后,编辑部的各个部门就都行动起来了:农业组自然是最忙的,党的生活组也闲不了——需要党组织这方面活动的经验啊,文艺组如果不去写快板,也得采访一个甚么先进人物[……]”编辑部里“最理想”的工业组,其五月份报道计划,“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报道就占去了一半发稿字数:都是报告、发言,写先进人物的通讯”(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12)。

而且权力关系的复述在这里得到更细致更为持续地实践——其中不少人“从前年起就宣传过了,去年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时候,又宣传过一阵”(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12)。“最幸运的,是他拿起来亲自抹掉几段,使这篇稿子尽量跟过去发过的稿子近似些,使作者的思想跟已经发表的社论近似些”(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7)。以致这样一份报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排排陌生的铅字。它叫人摸不清出版日期。你必须耐心到四块版上费力寻找,而所得到的还是非常微少”(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续篇)”50)。

其次,“编辑部”还承担了将广大社会编入权力象征关系、叙事网络的功能。编辑部安排采访。“采访”就是让“广大社会”参与权力的表达,把具体个人的语言、行动(亦即广阔的“社会生活”)剪辑连接到有关权力关联的大故事中。《在桥梁的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里面有着各种人物采访的计划部署,“典型”、“先进”的角色安排《爬在旗杆上的人》里面的一位摄影记者甚至成为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其致力于将人的身体——包括表情、装扮——编入权力框架当中:先进社的耿社长被安排坐在写着“社会主义之花”的大锦旗下照相;社员的送粪照,则要求套车,套漂亮的壮牲口,牲口额上扎上彩花,而且社员们必须换上新

衣服(耿简 21-24)。

另外,“读者来信”亦是一项重要手段。它在权力表达网络中设置了一个“读者”的位置,行使着权力系统征询认同与服从者的功能。“广大读者”通过阅读加入到权力的想象关系当中,接受权力网络的规训。《本报内部消息》中编辑部十分重视“读者来信”——一面是“批评性的《住在江边没水喝》的读者来信”居然登了头版的庆幸,一面则是有关“中学粮食供应不足的读者来信”,因不合“党的政策”被总编辑命令撤下来。而在《组织部》与《马端的堕落》里面,“读者来信”成为情节发展的转折点:

五月中旬,“北京日报”以显明的标题注销揭发王清泉官僚主义作风的群众来信。署名“麻袋厂一群工人”的信,愤怒地要求领导上处理这一问题。“北京日报”编者也在按语中指出:“……有关领导部门应迅速作认真的检查……”(王蒙 39)

第二份材料是“人民日报”转来的读者来信,控告马副书记毒打老婆,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处理(荔青 109)。

三、“反党”

面对这个权力网络及其种种运作,小说中,游离于权力网络之外的局外人以行动表达了直接的反抗与挑战。林震“没有和领导商量,擅自同意魏鹤鸣召集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在于搜集工人有关王清泉的意见,并向上级反映)。林震还在列席参加的区委常委会上,批评他的上级韩常新与刘世吾“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采取了容忍乃至麻木的态度!”。黄佳英则参加了“贾王矿工人拒绝开会的行动”,在行动中“还出了主意”。而在党支部会议上,她对上级陈立栋同样提出了批评。《改选》里头,工人们在会场中扭转了权力者对选举的操纵,“改选”老郝担任工会委员。

不仅如此,小说亦通过解剖权力者(党工作者)与权力网络(生活)的关系,对这一权力方式提出了质疑。我们看刘世吾的一番话:

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

的食欲,饭菜是他们作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王蒙 40)

这段话在王蒙的原稿中是这样的:

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饭菜是他们作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我们,党工作者,作出的不是饭菜,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同时,厨房的腥味也影响[……]。(人民文学编辑部 157)

这里的“厨房”与“炊事员”的比喻对应的便是权力网络与权力者的关系。被删除的“厨房的腥味”到底指什么?王蒙原稿中还有一段被删除的文字可以当作注脚:

(刘世吾)嘲笑地说“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小说里边,那是从正面,从下面来看生活,只知道生活的结果。我们,就可以从背面,从侧面,从上面来看生活,我们知道生活的过程,或者叫作内幕。”刘世吾又恢复了自负和满不在乎的神气。(人民文学编辑部 157)

这所谓“生活的过程”/“内幕”指的无非是权力网络及其种种征询、规训、清洗的表达与实际运作,其功能便像“厨房的腥味”一般,养成了刘世吾对待“是”与“非”,“爱与恨”,真相与因果的“冷漠”态度,亦即刘世吾的口头语“就那么回事”——

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王蒙 38)

“厨房的腥味”的比喻在马立元那里换成了“一只箱子”:

这几年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他为自己造了一只四四方方、厚厚实实的箱子,把自己装了进去。这箱子隔音、防潮,也不怕震动,可它同时也把阳光给隔在外面了。(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续篇)》53)

隔去了“阳光”,马立元身上则生长出一种叫“疲沓”的东西——“他已经掌握了他自己称之为‘规律’的一些概念和公式,把任何复杂的现象归纳到这里面,或者把它们套在任何事件上”(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16)。《在桥梁的工地上》则直接概括其主要人物罗立正的工作方式为“似是而非”——“如果局里要队上通知一下职工注意安全,队部就得叫工人讨论三次;如果局里说,安全问题必须组织一次学习,桥梁队就要拿一个星期的晚上作报告,组织层层讨论。但一个星期以后,队部也可以根本忘记安全这一回事”(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10)。探讨与追问这种“似是而非”的“精神”的根源则成了贯穿这篇小說的一条主线。一直到结尾,小说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17)。

当年评论者敏锐地发现了小说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李希凡尖锐地指出,在《在桥梁的工地上》的“作家的整个表现意图里,是要告诉我们,保守主义者的可怕,并不仅仅在于罗立正个人的精神状态,而在于这个社会的中枢——领导制度。罗立正的这种精神状态正是这种领导制度的结果”(李希凡,《“所谓”》105)。同样,他认为《本报内部消息》想要告诉人们的是“绝不是一个马文元的萎靡不振,或者是一个陈立栋的专横保守,而是整个党的领导,脱离了人民群众,阻碍了生活的前进,窒息了干部的独立思考的能力。”《马端的堕落》“分明不是在批判马端的堕落,而是在‘暴露’我们党组织的‘腐朽’”(李希凡,《“所谓”》106)。

林默涵认为刘世吾口中的“炊事员”的比喻,是“替自己作辩解的遁词”——“好像他的政治的衰退,不是由于他自己思想上的原因,而是由于他所担负的党的工作,仿佛党的工作是一种什么腐蚀剂,正是它锈损了人的心灵,使人变得麻木、倒退起来了似的。”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从整个作品所描写的气氛看来,与其说作者是在批判刘世吾的这种心情,毋宁说是在证实他的这种看

法”(林默涵 142-4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希凡指出,这股逆流,“是从修正主义的暗流开始,逐渐和社会上的反党逆流结合在一起,然后开始了全面地向党进攻”(“所谓”108)。

四、想象中的“党”/“上级”

小说中,作为能指的关键词“党”,拥有双重所指。它不仅仅指向权力组织,成为权力者所遭遇到的一整套有关“权力”及“权力运作”的语言表达的基石;而且支撑着权力系统的局外人林震们对于权力的想象。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关键词“党”,所支撑的对于“权力”的想象,成为林震们质疑与反抗现实中的权力运作的动力和依据。

林震对“党”的想象与建构首先来自“党课”与党章。当刘世吾向林震讲述他的“领导艺术”时,林震“觉得这跟他在小学时所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王蒙 35)。在党小组会上,林震引用党章为自己支持魏鹤鸣召集座谈会进行辩解,声称“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其次,小说与电影亦是建构林震对于“党”/权力的想象的重要途径。林震来到组织部报到,口袋里装着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而且林震“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对党工作者充满了“神圣的憧憬”(王蒙 31)。林震还一度“勇敢”地对刘世吾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区委以后发现了许多许多缺点,过去我想象的党的领导机关不是这样……”(王蒙 35)。

林震们想象中的“党”所连接的“权力”,超乎“个体”之上,却往往为某个具体的个人所承载,拥有无以伦比毋庸置疑的“力量”。在《组织部》里头,林震一直期盼着自己的行动获得“上级”的支持,始终希望得到在“上级”面前表达意见的机会。林震第一次去麻袋厂了解到王清泉的问题,便对魏鹤鸣说“你别光发牢骚,你批评他,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上级决不允许有这样的厂长”(王蒙 32)。之后当他从赵慧文那里了解到了组织部的情况,又与赵慧文说了同样的一番话“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对极了!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对区委书记谈,或者写成材料给‘人民日报’……”(王蒙 38)。^⑧

王蒙的小说原稿,便是以林震在想象中构筑的以关键词“党”为外壳的,一个“英明和强力”的“权力者”来结尾:

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林震?你上哪儿去了?快去找周润祥同志,他刚才找了你三次。”

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那么,不是从明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他还不知道区委书记是赞成他,斥责他,还是例行公事地找他“征求征求”意见完事;但是他相信,他的,赵慧文的,许多年青的共产党员的稚气的苦恼和忠诚的努力,总会最后得到领导英明和强力的了解,帮助,和支持,那时我们的区委会就会成为真正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人民文学编辑部 158)

与此同时,这一“权力”想象还担负着与实践中的“权力系统”相类似的征询功能。个体想象者与这一想象中的权力之间,建立的是一个单向的道德关联。个体惟有通过服从、皈依这一想象中的权力,才可能获得道德与历史的位置。《组织部》里面的林震已经是“党工作者”,他以“争取领导的指引”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坚信“会最后得到领导英明和强力的了解,帮助和支持”;而在《本报内部消息》里面,被文艺组的编辑“郭珂”视为“对党不满”的黄佳英,却以二十五岁“还不是个党员”为“一切心事中最大的心事”(刘宾雁 8)。事实上,“争取入党”正是贯穿这篇“反党”小说的一条红线。小说以讨论黄佳英入党的党支部大会结尾。会上,黄佳英陈述了入党申请书未写到的入党动机——“入了党,我就能更好维护党的利益”;支持黄佳英入党的“林胖子”则在发言中遣用了一个比喻——“现在我们知道了,每个党员都该是党的耳目,党的头脑……”(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续篇)” 58)。

而且,林震们在想象中赋予党(人格化权力)以及党工作者(权力的皈依者)以性格。^⑨在《组织

部》中,林震在想象中建构的理想性格,源自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女主人公娜斯嘉。这位被誉为“典型的俄罗斯性格”的坚强女性“刚强正直”,“言行从不二致”(尼古拉耶娃 93-104)。在小说《组织部》里面,刘世吾的“领导艺术”之一的“条件成熟论”,引发了林震对“娜斯嘉的‘对坏事决不容忍’”的想望(王蒙 35);当林震在区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并未引起“上级”认可时,林震再一次向口袋里的“小说”求援,他翻到了写有“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的一页,发出了到底他“缺少了什么呢”的疑问(王蒙 42)。

《本报内部消息》则一直在追问——如何才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尚未入党的黄佳英甚至质问她的男朋友工业部主任张野——“你说,你,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完全起了应该起的作用?”(刘宾雁 18)。而老共产党员马文元“想得最多的”是“共产党员该是怎样的人?”

这些人,也许是过得去的局长、科长、厂长、编辑,可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们的分量够不够呢?不是说一个党员不能有缺点,但是这些人身上短少的那个东西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短少的;马文元还不能用几个字把这东西概括起来,可是与这种精神相反的那个东西却是明明白白的两个字:冷淡。马文元需要的,不正就是这种对甚么事都不禁要管一管的那股热劲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续篇)” 54)

以致作为小说结尾的讨论黄佳英入党的党支部大会,变成了主题是何谓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辩论会。马文元的发言要阐明的主题是,“咱们党最需要的是甚么人?”,能否“从党性里阉割掉战斗性、创造性”? (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续篇)” 58)。在《马端的堕落》里面,“何生副书记”使用“党员的良心”的说法——

“党员的良心让我不能那么办。我不能看着工作中的错误不动声色,我不愿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去追求甚么老练和涵养,我不愿意歪着心眼去顺从任何一个人。”(荔青 108)

五、权力的清洗与再清洗

正因为权力组织的局外人林震们怀抱着对于权力的美好想象,他们对实践中的权力组织的内部清洗充满了期待。而小说对权力的内部清洗的表达本身也成为权力者进行权力清洗的工具,并担负起权力组织的征询功能。

《马端的堕落》里面,“县委组织部长”马端在讨论整党建党工作的县委会上宣读了一篇被一众与会者批评为公式化的报告,报告惟一有“具体内容”的一段被“小说”写成了如下“公式”:

我县原有党员××××名,在总路线灯塔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发展了×××名优秀的,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具有高度水平的先进的新党员。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我们清洗了××名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救药的分子。扩大了党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荔青 106)

而这篇小说的结尾,便是地委李书记出席的“处理”(清洗)组织部长“马端”的县委扩大干部会议。马端被处理的依据是地委会接到了三份材料。“一份是民利乡群众的控诉,说马副书记在民利乡搞粮食统购统销中,让干部不择手段地来完成任务。”“第二份材料是‘人民日报’转来的读者来信。”“第三份材料是县检察院根据群众的要求要依法惩处马端”(荔青 106)。这便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接种(The inoculation)修辞(Barthes 178),权力组织通过不断承认偶然的、局部的错误,不断清洗个别的权力者,以确保自身的免疫力。也正如李希凡所说的——“世界上再没有谁比共产党更懂得批评的意义了”(“论”7)。

更重要的是,权力的清洗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权力的征询过程。在权力的清洗过程中,群众/人民被赋予某种表达者和行动者的位置,一个人格化权力与群众/人民的想象性关联在权力清洗过程中被天衣无缝地建立起来。《组织部》通过“刘世吾”描述了宣布处理王清泉的工人大会:

“麻袋厂王清泉的处理,应该说还

是及时而有效的。在宣布处理的工人大会上,工人的情绪空前高涨,有些落后的工人也表示更认识到了党的大公无私,有一个老工人在台上一边讲话一边落泪,他们口口声声说着感谢党,感谢区委……”(王蒙 41)

在王蒙的原稿中,林震紧接着还有一段发言:

“我参加了那个会,群众无限地信任我们的党委机关。我们在党的英明的政策的指导下面,在党报和群众的支持推动下面,是给群众解决了问题的,群众用欢呼、鼓掌和热泪对待我们的党工作者,因为他们把我们看作党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们工作中的麻木、拖延、不负责任,是对群众的深深的犯罪。”(人民文学编辑部 157-58)

而且,小说有关权力清洗的表达本身,不仅承担了实际权力的征询功能,同时也成为权力清洗的庞大系统的组成部分。1957年毛泽东多次出面评价《组织部》的原因便在此。毛不仅肯定小说的“反官僚主义”,而且批评了马寒冰所认为的官僚主义的背景不应该安排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的意见(马寒冰 17)。毛明确指出,北京也有官僚主义,中央也曾出过坏人。毛当时发动的整风运动,便要求从“中央机关”开始(黎之 75;张光年 31)。有评论者专门从这个角度评价这篇小说——“尤其当我们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二中全会的文件,就愈加感到这篇作品的可贵。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反对官僚主义的矛头推进了一步”(王冬青 12)。

然而,《组织部》一方面为权力者纳入权力清洗系统当中,一面又为权力组织所不容,成为权力再清洗的对象。其原因在于,小说对于权力组织的内部清洗的希冀与表达,均基于对权力的想象,而这一想象本身不但成为小说人物挑战实践中的权力组织的动力与依据,而且唤起读者对这一权力想象的认同以及对现实权力的质疑。

在《组织部》这篇小说里面,“林震”是或一形式的人格化权力的想象者与塑造者;而在《组织部》的读者眼中,“林震”本身便变成了权力(力

量)的化身。读者“林颖”这样描绘林震在区委常委会上批评韩、刘的情形:

这声音是多么严正,是代表了多少人民群众的声音,这怎能不使刘世吾、韩常新等人惊慌呢! [……]一边是林震,另一边是韩常新和刘世吾,他们对立着,不可能妥协,也不可能调和,不是代表旧势力残余的韩常新、刘世吾之流失败,就是代表新生力量的林震失败。(林颖 7)

邵燕祥则直接以林震为“党的力量”的体现:

在这篇小说里,我不但感到了“这一场风波”开始时候强烈的气流,而且预感到它将以新生力量的胜利而结束。试想,在刚刚入党两三年的林震身上,就表现了这样充沛的革命热情和精力,对不良现象不容忍、不调和的原则性,这不正是党的力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么! (邵燕祥 21)^⑩

也因为如此,有清华大学学生以“林震是我们的榜样”为题参加《组织部》的讨论。他在文末说,“我要向作者王蒙同志致敬。因为他忠实地为我们描绘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他鼓舞我们勇敢地向旧的东西冲击,朝着光辉的未来迈步前进”(唐定国 13)。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的有关“权力想象”的表达本身,无法被现实权力所规训以致完全成为其征询系统的一部分。“林震们”想象中的“权力”尽管顶着一个“党”的能指,却不为现实中的“党”(权力)所驯服,也正如批评者所说的——林震作为正面人物,“没有力量”(艾芜 25)。在实质上,问题并不在于林震们是否有力量,而在于他们的“力量”应当源自何处,亦即其“力量/权力”与何种“表达系统”/“话语”相关联。

当年的批评者对小说的这一侧面有着十分有趣的描述。作家艾芜用了一个比喻——“幸而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小小的孤岛,有着清新的空气,可以暂免疫病,那就是赵慧文的卧室”(23)。李希凡则换了一个说法“党没有内在的生命力,只靠一个匹马单枪的‘青年英雄战士’的闯入,才能和

这个官僚集体进行奋战。而这个战士所依靠的,既不是领导的支持,也不是群众的协力,却只是一本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评”179)。两性阅读均属于私人领域,是实践中的权力网络无法贯彻的处所。权力网络惟有通过对与之相关的表达的规训,展现其威力与存在。《组织部》渲染林震与赵慧文之间的暧昧关系,讲述林震与刘世吾对艺术欣赏的向往,均溢出了现实权力所能规训和控制的范围。^⑪这意味着,小说人物林震展现出的力量,以及对读者的影响力均源自现实权力网络及其表达系统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批评这篇小说——“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那一节”(黎之 72)。

同样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组织部》一开始就用了多半节的篇幅推出了“工人形象”魏鹤鸣,小说中也有着林震多次下工厂与魏鹤鸣等工人开座谈会谈工作的情节,而且小说中惟一一次反官僚主义的胜利,依靠的就是林震所鼓励的魏鹤鸣及其它工人的向《北京日报》的长信,批评者却常常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作者注意魏鹤鸣方面的何其少?”(长之 14;“我们在作品中没有看到这些,没有看到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力量”(戴宏森 17);“魏鹤鸣和工人群众的力量却一点也没有写出来。因而小说给读者的印象是:麻袋厂对王清泉的斗争,只有林震一个人在那儿发挥作用”(汪国曾 13)。“她哀怨地陶醉于孤单和洁白,不懂得必须从魏鹤鸣那类工农群众中去获得锻炼和力量”(康濯 18)。

事实上,一众批评者笔下的“群众力量”、“工人群众的力量”、“工农群众”等词语,其实际所指并非现实中的民众,而是权力组织精心建构的一整套有关社会秩序以及权力结构的表达系统。正如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所言,“他们不知道从党和人民去汲取战斗的力量,所以,尽管他们嘴里说要‘更积极’、‘更坚强’,而在实际行动中就不能不显露出他们是软弱无力的。/林震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和落落寡合、孤芳自赏的情调,显然是不健康的,是还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143)。李希凡也论及这一方面:

王蒙同志的这篇小说,和围绕着小

说展开争论的焦点,[……]都表明着一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只能用毛主席的一段值得我们反复深思的名言来概括“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评”184)

这两位当时的权力者无疑向作者提出了警告——小说或者小说人物仍旧顽强地寻求在权力组织及其表达系统之外的行动与表达,其行动与表达的力量的来源将被切断与摧毁,而且最终将受到现实权力及其表达系统的惩罚。这也是其它逆流小说受批判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不仅仅是“逆流小说”,其它一时受到权力者称赞的文学作品,其后往往难逃被批判的命运。因为文学的表达(叙事)要成为可能就必须建构具体的“个人”,而权力的规训则仰仗一个抽象的、沉默的人格化的能指。惟如此,何种文学的表达与想象能逃脱被再清洗的命运?

注释[Notes]

① 黄子平在《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一文中问道“什么是‘医院’,而不是可能更为偏狭保守的乡村(如鲁迅的‘未庄’)?(同样,你也会问,什么是‘组织部’,而不是别的什么部?)”参见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148。

② 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本报内部消息》中有张野的“报导计划”,到了《改选》里面,则是“样板”。

③ 亦即王清泉所说的“对于上级,我负责,他们怎么处分我我也接受。对于我,你得负责,谁让你作生产科长呢?你得小心[……]”(王蒙 32)。同样,《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马文元也是这样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把部长的指示变成自己的指示,又把科长的报告变成自己的报告”(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15)。

④ 《本报内部消息》里的贾王矿的情形也是如此“一点芝麻大的事,也要层层布置,反复讨论,再三动员,组织保证。还不要说那些先党内、后团内,先干部、后群众的一套额外的附加会议”(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14)。

⑤ 亦即,“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王蒙 35)。或者如刘世吾所说,“党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王蒙 40)。

⑥ 亦即被李希凡的“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逆流”(《人民文学》10(1957):31-32)一文归入“逆流”的《在桥梁的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爬在旗杆上的人》、《马端的堕落》、《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改选》、《红豆》等小说。这些作品均发表于1956年4月至1957年7月的《人民文学》。

⑦ 譬如《在桥梁的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爬在旗杆顶上的人》、《马端的堕落》、《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红豆》等等。

⑧ 同样,《本报内部消息》里头的黄佳英,也一直想“给党中央写封信”,以“把自己在下面看见的某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和工人群众的要求告诉党”(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8)。

⑨ 这一想象中的性格与质量成为实践中的权力系统最外围的包裹物。

⑩ 刘绍棠、从维熙同样从这个角度看取林震的角色功能。他们说,“他(林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深刻地分析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和生活在周围的人。然而他有方向、有信心,因为给他力量的是党”参见刘绍棠、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艺学习》1(1957):17-18。

⑪ 这也是当时不少写“儿女情、家务事”的小说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艾芜“读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感想”,《文艺学习》3(1957):23-25。

[Ai, Wu. “Review on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3(1957):23-25.]

Bathers, Roland. *Mythologies*. London: Vintage, 2009.

长之“可喜的作品,同时是有严重缺点的作品”,《文艺学习》1(1957):14。

[Changzhi. “A Good Work with Serious Weaknesses.”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1(1957):14.]

戴宏森“一个区委干部的意见”,《文艺学习》1(1957):16-17。

[Dai, Hongsen. “Views from a Cadre from a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1(1957):16-17.]

人民文学编辑部“‘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新华半月刊》11(1957):157-58。

[Editorial Board of *People's Literature*. “Revisions o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People's Literature*.” *Xinhua Biweekly* 11(1957):157-58.]

耿简“爬在旗杆上的人”,《人民文学》5(1956):18-29。

- [Geng, Jian. "The Person On the Top of the Flagpole." *People's Literature* 5(1956): 18-29.]
- 洪子诚 “‘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一九四九年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王德威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 [Hong, Zicheng. "The Ques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Sixty Year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1949*. Eds. Wang Dewe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2011.]
- 康濯 “一篇充满矛盾的小说”,《文艺学习》3(1957): 16-22。
- [Kang, Zhuo. "A Novel Full of Contradictions."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3(1957): 16-22.]
- 荔青 “马端的堕落”,《人民文学》2(1957): 102-09。
- [Li, Qing. "The Degeneration of Ma Duan." *People's Literature* 2(1957): 102-09.]
- 李希凡 “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洪子诚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Li, Xifan. "A Review on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Materials of Theory on Chinese Fictions of 20th Century*. Vol. 5. Eds. Hong Zicheng,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论“人”和“现实”》。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
- : *A Study on "Human Being" and "Reality"*.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1959.]
- : “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甚么?”,《人民文学》11(1957): 102-08。
- : “What is the Essence of So-Called ‘Intervening Life’ and ‘Writing the Reality’.” *People's Literature* 11(1957): 102-08.]
- 黎之 《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Li, Zhi. *A Record on Activit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Zhengzhou: 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林默涵 “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新华半月刊》7(1957): 141-44。
- [Lin, Mohan. "A Novel Triggering Controversy." *Xinhua Biweekly* 7(1957): 141-44.]
- 林颖 《生活的激流在奔腾》,《文艺学习》12(1956): 6-8。
- [Lin, Ying. "The Currency of Life is Running."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12(1956): 6-8.]
- 刘宾雁 “在桥梁工地上”,《人民文学》4(1956): 1-17。
- [Liu, Binyan.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a Bridge." *People's Literature* 4(1956): 1-17.]
- : “本报内部消息”,《人民文学》6(1956): 6-21。
- : “The Internal Report from Our Newspaper.” *People's Literature* 6(1956): 6-21.]
- : “本报内部消息(续篇)”,《人民文学》10(1956): 48-59。
- : “The Internal Report from Our Newspaper (II)”. *People's Literature* 10(1956): 48-59.]
- 马寒冰 《准确地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艺学习》2(1957): 16-18。
- [Ma, Hanbing. "A Need for Truthfu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f Our Time."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2(1957): 16-18.]
- 迦林娜·尼古拉耶娃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草婴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
- [Nikolayeva, Galina. *The Head of a Tractor Station and The General Agriculturist*. Trans. Cao Ying.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1955.]
- 邵燕祥 “去病与苦口”,《文艺学习》1(1957): 19-21。
- [Shao, Yanxiang. "A Cure of Diseases and A Bitter Taste to Mouth."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1(1957): 19-21.]
- 唐定国 “林震是我们的榜样”,《文艺学习》12(1956): 13。
- [Tang, Dingguo. "Linzhen is Our Model."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12(1956): 13.]
- 王冬青 “生动地揭露了新式官僚主义者的嘴脸”,《文艺学习》12(1956): 12。
- [Wang, Dongqing. "A Lively Revelation of the Bureaucracy with New Appearance."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12(1956): 12.]
- 汪国曾 “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文艺学习》2(1957): 12-14。
- [Wang, Guozeng. "A Need for Actual Analysis of Literary Works."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2(1957): 12-14.]
- 王蒙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文学》9(1956): 29-43。
- [Wang, Meng.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People's Literature* 9(1956): 29-43.]
- 谢泳 “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6(2002): 31-34。
- [Xie, Yong. "A Re-Review on *The Young Newcomer to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Southern Literary World* 6(2002): 31-34.]
- 张光年 “在颐年堂听毛泽东谈双百方针”,《百年潮》4(1999): 29-31。
- [Zhang, Guangnian. "Listening to Mao Zedong's Remarks on Two-Hundred Guideline at Yiniantang." *Hundred Years Current* 4(1999): 29-31.]

(责任编辑:王嘉军)